学术专论

盛京大会的遗珠：清朝对蒙古喀喇车里克部的安置

玉　海

[摘要] 后金天聪年间蒙古各部纷纷来归后，在崇德元年的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16部49名贵族与满汉贵族臣僚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臣汗”，正式确立君臣关系。在漠南蒙古地区设旗编佐的过程中，唯独喀喇车里克部未能独立建旗，随之失去原有的相对独立性，其部名也逐渐被世人淡忘。自天聪四年噶尔玛台吉率众来归至康熙四年的索诺木兄弟南下归附清朝，喀喇车里克部归清之举历时三十余年，被编入翁牛特右翼旗、克什克腾旗和满蒙八旗等不同管理体制，成为清朝管理蒙古各部的特殊案例。

[关键词] 喀喇车里克部　哈赤温后裔　翁牛特右翼旗　八旗　清代

[中图分类号] K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1－0047－010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的“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16部49名贵族与满汉贵族臣僚一道共上皇太极尊号，称“博格达彻臣汗”（Boγda sečen qaγan），确立君臣关系，正式承认清朝的统治。在此次盛京大会上，天聪汗皇太极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此，在漠南蒙古各部领地和属民的基础上，设旗编佐，推行清朝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北元时期的汗、济农、洪台吉等贵族封号也随之被清朝的新爵位所替代。

众所周知，在察哈尔、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东土默特、扎鲁特、四子、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喀喇沁、乌拉特等16部中，其他各部均有以各自部名命名的外藩蒙古扎萨克旗，唯独喀喇车里克部有噶尔玛台吉和阿鲁诺木齐2名首领参加盛京大会的情况下，未能独立建旗，其部名也逐渐被世人淡忘。

喀喇车里克部为“阿鲁蒙古”诸部之一。其部落名称在《蒙古秘史》等早期文献中没有记载。明代汉籍史料《登坛必究》中仅有几句“所管部落哈喇扯令官儿兄弟二人，兄委正小厮台吉，弟者木利台吉”，[①] 提到的两个台吉无从考证。《蒙古黄金史》和《黄金史纲》等蒙古文史书叙述有关达延汗平定右翼三万户叛乱时，虽有提到喀喇车里克部首领，但没有交代更加详细的

[收稿日期] 2022–09–26
[作者简介] 玉海（1973—　），男，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教授，呼和浩特 010021，hasdalai302@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中国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22VLS011）子课题“明清时期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 王鸣鹤：《登坛必究》卷23《胡名》，清刻本。

信息，很难获取喀喇车里克部早期的信息，① 反而在清代成书的各种满、蒙、汉文文献和档案的记载相对丰富，可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

喀喇车里克部的归清之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为，天聪四年（1630）主要首领和主体部众南下归附；第二个为，康熙四年（1665）跟随索诺木兄弟来归的喀喇车里克部人户被编入克什克腾旗，喀喇车里克部前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归清之举才落下帷幕。关于第二次归附，曾在拙文《康熙年间归附的喀喇车里克部人户问题初探》中有过探讨，在此不再赘述。②

关于“喀喇车里克”部名由来，贾敬颜的《阿禄蒙古考》一文中解释为“黑军”。③ 张永江在《从顺治五年蒙古文档案看明末清初翁牛特、喀喇车里克部的若干问题》中，结合贾敬颜的研究，提出源自元代“黑军”的观点。④ 从字面上看，上述二位学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是未能细述其中的演变过程，略显遗憾。

一、归附后金前后的喀喇车里克部

不管是蒙古文文献，还是汉文史料，对于喀喇车里克部的先祖记载一致，即为蒙克博罗特察罕诺颜次子巴泰车臣诺颜。以《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为例，《翁牛特部总传》中只提到巴泰车臣诺颜，再以后的噶尔玛等人之间的世系及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的亲族关系没有详细记述。如：

> 元太祖弟谔楚因，称乌真诺颜，见元史表。其裔蒙克察罕诺颜，有子二：长巴延岱洪果尔诺颜，号所部曰翁牛特。次巴泰车臣诺颜，别号喀喇齐哩克部。皆称阿鲁蒙古……巴泰车臣诺颜三传至努绥，子二：长噶尔玛，次诺密泰岱青。⑤

《蒙古游牧记》和《皇朝藩部要略》的记载与之基本相同。⑥

（一）喀喇车里克部贵族世系

从相关文献中很难再找出更为详细的世系谱。自从发现国家图书馆所藏《昭乌达盟盟务帮办备兵扎萨克翁牛特扎萨克和硕亲王衔多罗杜棱郡王赞巴勒诺尔布旗王公协理台吉等家谱》（以下简称《家谱》）后，⑦ 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的世系及其亲族关系这一难题终于得到解决。入清前后的世系如表 1。

（二）喀喇车里克部归附后金的时间

关于噶尔玛为首的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归附后金的时间，《王公表传》记载为“天聪六年逊杜棱、栋岱青及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率属来归”。⑧ 据《满文老档》记载，噶尔玛已于天聪五年

---

① 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色道尔吉译，蒙古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58 页；佚名：《汉译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97、197 页。

② 玉海：《康熙年间归附的喀喇车里克部人户问题初探》，赵志强编：《满学论丛》第 7 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7 年，第 102 页。

③ 贾敬颜：《阿禄蒙古考》，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 3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44 页。

④ 张永江：《从顺治五年蒙古文档案看明末清初翁牛特、喀喇车里克部的若干问题》，*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Ⅰ. Tokyo, 2005.

⑤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31《翁牛特部总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54 册，北京出版社，2012 年。

⑥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3《翁牛特》，同治六年寿阳祁氏刻本；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1《内蒙古要略一》，文海出版社，1965 年。

⑦ *ǰuu uda-yin čiγulγan-u kereg-i Tusalan sidkegči Čirig-ün ǰasaγ böged Ongniγud-un ǰasaγ Qošoi čin vang-un ǰerge Törö-yin dügüreng giyün vang Zambalnorbu-yin qosiγun-u Vang Güng Tusalaγči tayiǰi narun gerün üy-e-yin bičimel*，国家图书馆藏，馆藏号：0845。

⑧ 《王公表传》卷 31《翁牛特部总传》。

四月拜见皇太极。[1] 据此推断，喀喇车里克部归附后金的时间为天聪六年并不可靠。

表 1　入清前后喀喇车里克部贵族世系

<table>
<tr><td rowspan="8">巴泰车臣诺颜
Batai sečin noyan</td><td rowspan="8">长子
库登车臣
Küdüng sečin</td><td rowspan="4">长子
图美诺颜
Tümei noyan</td><td rowspan="2">长子
努绥诺颜
Nusui noyan</td><td>长子 镇国公噶尔玛
Karma</td><td></td></tr>
<tr><td>次子 诺密泰岱青
Nomitai dayičing</td><td></td></tr>
<tr><td>次子 巴拜楚呼尔
Babai čükür</td><td></td><td></td></tr>
<tr><td>三子 诺延泰伊尔登
Noyantai ildeng</td><td>长子 阿鲁诺木齐
Arunomči</td><td></td></tr>
<tr><td rowspan="2">次子
图木呼诺颜
Tümükü noyan</td><td rowspan="2">长子
昂锦珠尔墨尔根诺颜
Anggilǰuur mergen noyan</td><td>三子 达尔玛
Darma</td><td></td></tr>
<tr><td>四子 阿地赛 Adisa</td><td></td></tr>
<tr><td rowspan="2">三子
托辉卓里克图
Toqoi ǰoriγtu</td><td>长子 塔格都勒诺颜
Ta γ dul noyan</td><td>次子布亚 Büy−a</td><td>长子 寨赛
ǰayisa</td></tr>
<tr><td>次子 唐古特诺颜
Tang γ ud noyan</td><td>长子 阿拜代巴图鲁
Abayitu batur</td><td></td></tr>
</table>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以下简称《题本》) 中有一份康熙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题名为《理藩院尚书喀兰图等题议喀喇车里克公奇塔特仍在多罗郡王属下承应差事本》的题本，其中提到“其祖父噶尔玛公，于马年率五百属民来归”。[2] 这份题本透漏一个重要信息，即喀喇车里克部噶尔玛率所属部众来归的时间，但时间只说“马年”，没有明确指出哪一马年。噶尔玛天聪年间来归当无疑问，而且天聪年间只有一个马年，那就是天聪四年的庚午年，即 1630 年。结合题本的信息，可以推定喀喇车里克部来归时间为天聪四年，应与翁牛特部孙杜棱等的归附在同一年，但只凭一份题本的记载，很难断定准确的时间。在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中有一份三等台吉车仁达尔巴呈报的世袭文书，该档案的记载可以印证此题本的准确性。虽然这份档案字迹潦草，内容稍有混乱，但是记载喀喇车里克部的来归时间这一点非常重要。原文如下：

(1) Γudaγar ǰerge tayiǰi Čirendarba−yin kürgeǰü (2) iregsen bičig−dür, Qara čireg−ün tayiǰi (3) Darma Sumenggüvan−i bari ǰerge−ber daraqačilan (4) [ ][3]ǰanggi Üčilan Erke čin vang−un bari−yi (5) beyen−ü čireg−dü yabuγsan, Čaqatai güng, (6) tayiǰi Darma, Amba ǰanggin Üčilan. Qara (7) čireg−ün tayiǰi Darma Kerleng−ün γool−ača (8) ○ ○ boγda ejen−i daqay−a kemen Qara morin ǰil irelüge……[4]

汉译：

三等台吉车仁达尔巴送来之文书中，与总兵官交战，再与 [ ] 章京乌奇兰（音译）带领自己的兵，跟随豫亲王出征。察哈岱公、台吉达尔玛、安巴章京乌奇兰、喀喇车里克台吉达尔玛，为归顺圣主于壬午年来自克尔楞河……

这份档案没有成文日期，但据与车仁达尔巴相关的其他档案的记载，呈报时间应为乾隆二十几年。文中的“察哈岱公”是镇国公噶尔玛长子。据《家谱》记载，“喀喇车里克台吉达尔玛”是库登车臣次子图木呼诺颜之孙，昂锦珠尔墨尔根诺颜第三子，是噶尔玛的堂兄弟。与题本比对，来归时间一个是“午年”，另一个是“壬午年”，在马年来归这一点上两份档案相一致。天聪年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111 页。

② 其原文拉丁文转写为：“……(6) ○○ ejen−de dahara−de karacirik−i garma gung aru baci, morin aniya sunja (7) tangg ū jušen gajime dahaha. ……”乌云毕力格等主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90 页。

③ 此处一字无法辨认，以 [ ] 符号代替。

④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赤峰市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1–1–184–3。

间只有一个“马年”，所以可以肯定噶尔玛等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是天聪四年与孙杜棱等一起南下归附后金的。

次年四月初六日，孙杜棱、达赖楚呼尔、僧格和硕齐等率阿鲁诸部贵族与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一同觐见皇太极，“汗与贝勒入黄幄落座，孙杜棱、达拉海、纳玛西奇、德叻克依遥拜一次。孙杜棱复近前跪时，汗起立受之。第三次跪时，汗亦迎面跪拜，行抱见礼”。拜见之后安排的座次也能反映出皇太极非常重视孙杜棱的来归，让他坐于自己的左侧。次日，栋岱青、喀喇车里克噶尔玛等诸贵族也觐见天聪汗皇太极。

（三）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世系小考

据《家谱》记载，喀喇车里克部另一位重要人物诺密泰岱青是努绥诺颜的次子，与噶尔玛是亲兄弟关系。那么，与噶尔玛一同参加盛京大会的漠南蒙古16部49贵族之一的阿喇纳诺木齐属于喀喇车里克部哪一支系，与诺密泰岱青是否同一个人？玉芝在她的研究中，结合《满文老档》的记载，得出二人不是同一个人的结论。① 玉芝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未能进一步考证出他与噶尔玛、诺密泰岱青兄弟二人的亲族关系。从《家谱》的世系中直接找不到“阿喇纳诺木齐”这个人，与此相近的有一个名字“阿鲁诺木齐”。这位阿鲁诺木齐是努绥诺颜三弟诺延泰伊尔登之子。这两个名字的蒙古文书写，“阿喇纳诺木齐”为“Arnanomči”，“阿鲁诺木齐”为“Arunomči”，都有鼻音的转变，发音比较相近，可视作同一人。崇德元年十一月清朝派阿什达尔汉等赴外藩蒙古分编牛录时，喀喇车里克部的牛录数为“噶尔玛之一百五十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德格图、劳萨、多西。诺木岱之七十家，章京姓名拜都。阿喇纳之一百六十七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博罗胡、额森德依、布岱。索尼岱之五十家，章京姓名塔里岱。阿地赛之五十家及寨赛之十五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绣格。以上共五百家，九牛录”。②

根据蒙古人传统财产继承规则，作为图美诺颜（库登车臣长子）幼子诺延泰伊尔登的继承人，阿喇纳诺木齐所得份子比努绥诺颜二子噶尔玛和诺密泰岱青各自继承的份子还要多，与噶尔玛一同代表喀喇车里克部参加盛京大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据《家谱》记载，《满文老档》中的阿地赛为库登车臣次子图木呼诺颜之孙，昂锦珠尔墨尔根诺颜幼子，顺治八年（1651）受封三等台吉。寨赛为库登车臣三子托辉卓里克图长子塔格都勒诺颜之孙，顺治八年被赐号“哈丹巴图鲁”，封三等台吉。③ 从《家谱》找不到与索尼岱对应的人名。

《满文老档》中的总户数502与《题本》记载的500属民的数量基本一致。只是《满文老档》和《题本》中所说的户数是被编入翁牛特右翼旗的喀喇车里克户数，其中不包括被编入八旗的喀喇车里克部人户。库登车臣三子托辉卓里克图之孙阿拜代巴图鲁一支全部被编入满蒙八旗。据此可知，噶尔玛从阿鲁地方来归之时的属民不只是这502户。

二、编入翁牛特右翼旗的喀喇车里克部众

噶尔玛所率502户是南下归附后金的喀喇车里克部众主体。崇德元年清朝分设翁牛特左右二旗时，噶尔玛等喀喇车里克部贵族及其部众被编入翁牛特右翼旗，游牧于老哈河流域，与敖汉旗相邻。④

（一）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喀喇车里克镇国公世系

天聪四年，噶尔玛等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来归之后，屡次率所部参加后金及清朝的军事行

① 玉芝：《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6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第1669页。
③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923–1。
④ 玉海：《清代翁牛特右翼旗与周边蒙旗旗界变更》，《蒙古学集刊》2021年第1期。

动，攻打明朝的北京、山东等地。崇德八年噶尔玛因功被封为镇国公。①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中有一本翁牛特扎萨克杜棱郡王旺舒克盖上扎萨克印并呈报于理藩院的纸线装订底册，共七页，名为《翁牛特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旺舒克旗恭格喇布坦家世、父祖功绩之呈报册》。② 该底册内容包括授予镇国公噶尔玛的诰命及至恭格喇布坦的六代镇国公的袭爵时间，详细记述了喀喇车里克部噶尔玛归附后金后因功授封镇国公及察哈岱等五代镇国公的承袭爵位情况。

除此之外，印务处档案中还有一份末代镇国公旺布林沁呈报该旗印务处的名为《公旺布林沁呈报官员》的文书。该文书记载了恭格喇布坦之后四代六任镇国公的袭爵情况。内容从恭格喇布坦之子达瓦什哩开始至末代镇国公旺布林沁，是上一份恭格喇布坦呈报内容的后续。可以看出，自噶尔玛开始，有清一代共 10 世 12 人授封或承袭镇国公爵位。

据旺布林沁的呈文和《王公表传》的记载，桑噶巴拉被剥夺公爵后由其二弟纳完顿如布于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初一日承袭镇国公爵位，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赐戴花翎。③ 因纳完顿如布无嗣，于咸丰六年（1856）二月初八日由其三弟永荣承袭镇国公爵位，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赐戴花翎，十一年晋升为乾清门行走。同治十二年（1873）旺布林沁承袭其父永荣的镇国公爵位，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二十三日赐戴花翎。④

据宣统三年（1911）七月十七日的《遵查本旗各庙达喇嘛名数租产清册》，翁牛特右翼旗有寺庙十二座，其中寿兴寺（Öljei delgeregči süm–e）为镇国公于乾隆年间在三家村所建寺庙。⑤ 该旗其他蒙古文档案中记载的“镇国公察哈岱于乾隆年间所建”，⑥ 显然与史实不符。察哈岱于顺治十六年病故，不可能生活在乾隆年间，更何况在顺治年间，清兵入关不久，定都北京只不过十余年，以当时的局势，察哈岱建立寺庙的可能性不大，“乾隆年间所建”应该更接近史实。生活在乾隆年间的镇国公有三人，分别为索诺木、恭格喇布坦、达瓦什哩。建立寿兴寺的镇国公应该是此三人中的某一位。

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喀喇车里克镇国公爵位的世袭顺序为：噶尔玛（Karma）→长子察哈岱（Čaqadai）→长子奇塔特（Kitad）→长子齐旺多尔济（Čivangdorǰi）→长子索诺木（Sonom）→次子恭格喇布坦（Günggarabtan）→四子达瓦什哩（Davasiri）→长子乌呢济尔噶勒（Öniǰirγal）→长子桑噶巴拉（Sang γ abala）、次子纳完顿如布（Navandonrob）、三子永荣（Yöngröng）→永荣子旺布林沁（Vangburinčin）。

（二）喀喇车里克镇国公与扎萨克郡王间的讼案

喀喇车里克部噶尔玛虽与翁牛特部孙杜棱等同为哈赤温后裔，但上面提到过的《满文老档》和《清实录》的记载证明，噶尔玛自率所部归附后金至盛京大会，均以独立的蒙古部落首领的名义参加后金的政治军事活动。并且，南下后喀喇车里克部与翁牛特部都有各自的游牧地，与大军汇合的地点也互不相同。相关文献档案对初代镇国公噶尔玛和二代镇国公察哈岱的活动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他俩分别于顺治五年和顺治十六年相继去世之后，察哈岱长子奇塔特承袭镇国公爵位。据《家谱》记载，察哈岱有子二：长子奇塔特全名为“毛奇塔特”（Muukitad），次子三等台吉孟和。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中的《翁牛特扎萨克喇特那济哩第

① 《王公表传》卷 32《镇国公噶尔玛列传》。

②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256–9。蒙古文名称为 *Ongniγud–un ǰasaγ–un Törö–yin dügüreng giyün vang Vangšuγ–un qosiγun–u Ulus–un tüsiy–e güng Günggarabtan–u uγ ündüsün, ečige ebüge–yin ǰidkügsen γabiy–a–yi bayičaγaǰu ergün bariqu debter*。

③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646–1。

④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761–2。

⑤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1430–14。

⑥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1430–9。

旗头、二、三等台吉等根本、承袭之详察呈报册》[1] 误记孟和为察哈岱长子。

参加盛京大会的外藩蒙古 16 部中，唯独喀喇车里克部没有设立单独的扎萨克旗而被编入孙杜棱掌管的翁牛特右翼旗。噶尔玛和察哈岱时期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我们无法得知他俩与本旗扎萨克之间的关系。到奇塔特时期，他还记得自己的喀喇车里克部在设旗之前不归翁牛特部管理，因而发生状告扎萨克郡王毕哩衮达赉的事情。据《题本》透漏的信息，喀喇车里克系贵族并不认可扎萨克郡王的约束，所以对其罚马一匹表达不满，进而一纸诉状告到理藩院。[2] 该题本所说天聪汗皇太极授予噶尔玛扎萨克一职实指盛京大会召开之前，噶尔玛台吉管理自己所率喀喇车里克部一事，与后来的一旗之扎萨克不同，所以朝廷并未认可镇国公奇塔特的诉求，将其被罚之马，命扎萨克郡王毕哩衮达赉返还了事。

自康熙五年奇塔特状告旗扎萨克杜棱郡王毕哩衮达赉之后，喀喇车里克系镇国公的地位明显得到提高，历代镇国公先后担任旗协理台吉职务，与扎萨克郡王家族之间的关系趋于融洽，郡王家族和镇国公家族似乎分割了该旗旗务管理权。但桑噶巴拉袭爵后，他与扎萨克郡王喇特那济哩第之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纠纷，欲在盟长及热河都统处呈诉该扎萨克欺压等事。因被该扎萨克郡王查拿阻止，派护卫济克默特将诉状直接呈递到理藩院。理藩院题奏请旨后，交由热河都统衙门审理。现存的呈文为理藩院交由热河都统衙门审理桑噶巴拉所控事件而札行的文书抄底。因桑噶巴拉所递蒙古文原呈，语句繁冗，理藩院将其译成汉文题奏。

桑噶巴拉的控文涉及三件事情：一、郡王喇特那济哩第欺压喀喇车里克系镇国公桑噶巴拉及其父乌呢济尔噶勒等人；二、桑噶巴拉先祖察哈岱享有直接向朝廷陈奏之权；三、与郡王喇特那济哩第分旗另立或要求被编入他旗。[3] 桑噶巴拉的这些举动与其先祖奇塔特呈控事件在本质上具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对一直以来喀喇车里克部贵族受制于扎萨克郡王的不满。察哈岱的直接陈奏权在其他档案文献中没有得到体现，是否真有此事，还是桑噶巴拉的理解错误，无从得知。最严重的是最后一项，分旗另立或被编入他旗。其余两项交由热河都统衙门审理，唯独这一项在题奏中直接被斥责为"亦属不安本分，任意妄陈，殊属违制"。如果其他两项也存在夸大其词、蓄意诬陷的话，桑噶巴拉将会受到严惩。

如前所述，参加盛京大会的 16 部中，二部同为一旗，仅此一例。自巴延岱洪果尔诺颜和巴泰车臣诺颜时期各领所部至归附后金，二部分立已有很长时间。南下西喇木伦河流域后孙杜棱和噶尔玛也各率所部，互不统属。后来设立扎萨克旗时，哈赤温后裔所部中出现了一部分为二旗（翁牛特左右翼）或二部合为一旗（孙杜棱与噶尔玛的二部被合编为翁牛特右翼旗）的局面。因此，奇塔特和桑噶巴拉屡屡提起先祖相对独立之事，试图独立建旗。这次桑噶巴拉控诉郡王喇特那济哩第案件，牵涉大小官员、民人等十多人。根据蒙古律和刑部律，经过热河都统的审理，再理藩院题奏后，桑噶巴拉被剥夺公爵，扎萨克郡王喇特那济哩第被罚俸六年。济克默特等相关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4]

从最终结果来看，朝廷的态度与康熙时期处理奇塔特控诉扎萨克郡王毕哩衮达赉时的态度截然不同。奇塔特时期朝廷还以安抚息事为主，采取的惩罚措施也是象征性的，到道光时期，已过近二百年，朝廷对外藩蒙古不再拉拢安抚，而是就事论事趋于强硬。镇国公桑噶巴拉提出的分旗而立主张，不仅受到打击，还丢掉公爵。喇特那济哩第也受到罚俸六年的严厉惩处。

---

①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418–1。蒙古文名称为 *Ongniγud ǰasaγ–un Törö–yin dügüreng giyün vang Radnagiridi–yin qosiγun–udotoraki terigün, ded, γudaγar ǰerge tayiǰi narun uγ eki, kerkin ǰalγamǰilaγsaγar iregsen–i todorqayilan bayičaγaǰu ergün bariqu debter*。

② 乌云毕力格等主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第 390–392 页。

③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432–4。

④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档案号：1–1–432–6。

三、编入满蒙八旗的喀喇车里克部

如上所述，噶尔玛等喀喇车里克部贵族及其所部编入翁牛特右翼旗，但这并非南下归附后金的所有喀喇车里克部众，而是其中一部分被编入满蒙八旗。关于这部分喀喇车里克部众，《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简称《初集》）有如下记载：

> 崇德八年六月庚寅，谕户兵二部曰："各固山下，所有伊苏忒、喀喇车里克部落之闲散蒙古，无得令其隐漏。户部宜清察人丁，编入牛录。兵部再加察核，俱令披甲。其现在满洲固山下察哈尔、喀尔喀等部落蒙古，亦当察其壮丁增减，勿令隐匿。至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下闲散蒙古，亦编为小旗，设壮大管辖之。"①

由此断定，南下归附后金的喀喇车里克部户数不只是编入翁牛特右翼旗的502户。据《家谱》记载，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中有一位阿拜代巴图鲁，他是库登车臣之孙唐古特诺颜的长子，他的一支在京城。② 这位"阿拜图巴图鲁"即在后文中出现的"阿拜代巴图鲁"（或写为"阿拜岱巴图鲁"）。此人为编入八旗的喀喇车里克部首领。他的子孙在清兵入关、定都北京等重要军事行动中效力军中，立有功勋。

（一）蒙古正白旗塞尔格克和硕齐部众

关于阿拜代巴图鲁及其子孙，蒙、汉文文献均有记载，只是蒙古文史料的表述相对简略，只说哈赤温后裔，无法确认被提到之人为喀喇车里克部出身。《蒙古黄金史》和《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均提到"正白旗内大臣塞尔格克和硕齐"，说他是哈赤温后裔，但未说明出身于哈赤温后裔的哪一分支。③ 为了考证《家谱》记载的准确性和塞尔格克和硕齐的出身，需要查找清代的其他文献。关于阿拜代巴图鲁和塞尔格克和硕齐，《清实录》《初集》《清史稿》《满汉名臣传》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清世祖实录》载：

> 以故三等甲喇章京吴巴赉三晋弟古睦、阿拜岱巴图鲁子塞尔格克各袭职。④
>
> 叙征锦州、杏山、山海等处破敌功，以三等辅国将军宗室额克亲为二等辅国将军，三等奉国将军宗室班布尔善为二等奉国将军，三等甲喇章京萨必图、噶达浑、雅素特纳睦、渥赫、塞尔格克为二等甲喇章京。⑤
>
> 以塞尔格克为内大臣。⑥
>
> 削散秩大臣精奇尼哈番顾穆对车臣、沙济德尔格尔、内大臣阿思哈尼哈番塞尔格克各一半前程，内大臣达苏屠禄会、护军统领赖塔各一拖沙喇哈番，罚银五十两，仍留原任。以皇上还宫时不行肃清及不候驾，先还私宅故也。⑦
>
> 以一等阿达哈哈番塞尔格克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⑧
>
> 遣一等侍卫吴丹，视内大臣塞尔格克病。⑨

---

①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李洵、赵德贵主持校点，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页。

② 其原文拉丁文转写为：(1) Aqamad köbegün Abayitu Batur (2) noyan−u bey−e Ging qotan−dur (3) ba γ ta γ san−u tula egün−ü (4) ür−e−yi ende ese bičibei.

③ 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第380页；罗密：《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蒙古文），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乔吉审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④《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甲午。

⑤《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丁未。

⑥《清世祖实录》卷86，顺治十一年十月乙亥。

⑦《清世祖实录》卷121，顺治十五年十月丙子。

⑧《清世祖实录》卷125，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丙寅。

⑨《清圣祖实录》卷41，康熙十二年正月丁亥。

谕兵部，勤劳匪懈臣子尽职之心。爵秩攸加，国家酬庸之典。库禄克达尔汉阿赉等，自太宗文皇帝以来，或效力行间，或恪恭左右，或招抚外国，均奉职有年，克著劳绩，宜加宠锡，以示眷怀。库禄克达尔汉阿赉、希尔根、坤巴图鲁，俱着加太子太保。毕力克图、性纳、胡礼布、伊尔度齐，俱着加太子少师。布叶锡礼、道喇、穆福、席卜臣、孙达礼巴图鲁，俱着加太子少傅。伊尔门、塞尔格克、赉图库、尼雅翰、查哈太，俱着加太子少保。①

予故内大臣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塞尔格克祭葬，谥勤敏。②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塞尔格克是喀喇车里克部阿拜代巴图鲁之子，这与《家谱》的记载相吻合。阿拜代巴图鲁已于顺治元年（1644）去世，塞尔格克后来官至内大臣加太子少保，与伊苏特部喀兰图生活在同一时期，二人的地位及受到的恩遇大致相当。《初集》亦载："姓博尔济格氏，世居翁牛特地方，国初随其父慕义来归。"③ 虽然没有指明塞尔格克为喀喇车里克部阿拜代巴图鲁之子，但是已指出他的姓氏、出生地及与父同来这几条重要的信息。姓氏"博尔济格"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无疑，"翁牛特地方"应指哈赤温后裔的属地，因为《初集》的成书时间是雍正时期，此时"翁牛特"之名已专属哈赤温后裔。《清史稿》的记载指出"先世居喀喇彻哩克部"。④ "喀喇彻哩克部"即"喀喇车里克部"，加上其父名为阿拜代巴图鲁，可初步断定塞尔格克为喀喇车里克部贵族身份。《满汉名臣传》记载："色尔格克，蒙古正白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先世居喀喇彻哩克部。父阿拜代巴图鲁太宗文皇帝天聪时率众来归，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⑤《满汉名臣传》成书于清代，相比《清史稿》所载内容的可信度更高，其记述再次印证塞尔格克出身于喀喇车里克部。

据以上记载，阿拜代巴图鲁为家谱中的"阿拜图巴图鲁"，《蒙古黄金史》和《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提到的"正白旗内大臣塞尔格克和硕齐"是喀喇车里克部库登车臣三子托辉卓里克图的曾孙。根据《家谱》《初集》《清实录》的记载，阿拜代巴图鲁及其子塞尔格克的世系为：巴泰车臣诺颜→长子库登车臣→三子托辉卓里克图→次子唐古特诺颜→长子阿拜代巴图鲁（Abayitu batur）→子塞尔格克和硕齐。

《家谱》中提到阿拜代巴图鲁一支在京城，说明噶尔玛、阿喇纳诺木齐及其后裔对阿拜代巴图鲁及其子孙的归宿，具有一定的了解。再从天聪年间阿拜代巴图鲁率所部来归看，可以肯定他与噶尔玛等喀喇车里克部诸贵族一同南下归附后金的。阿拜代巴图鲁于顺治元年去世，其子塞尔格克袭职。由此塞尔格克一支喀喇车里克部众被编入蒙古正白旗。正白旗蒙古都统右参领所属十五佐领中的第十佐领是由塞尔格克和硕齐及其子孙管理，并以喀喇车里克部众为主的佐领。其编佐状况，《初集》记载如下：

第十佐领，原系天聪九年编立之半个牛录，初以沙济管理。后至京都，合并杨西穆、桑阿尔寨两分管下人丁，始编为数牛录，以星南管理，星南年老辞退，以其弟沙里管理。沙里缘事革退，以沙里之祖内大臣塞尔格克管理。塞尔格克年老辞退，以其子阿玉锡管理。阿玉锡故，以其兄之子神保管理。⑥

据该书卷二百十五《勋臣传十五》之《沙济列传》，沙济初系空衔牛录章京。⑦ 后与杨西穆、桑阿尔寨分管的人丁合并，始编正式的佐领，始任佐领为星南。星南和沙里是塞尔格克的孙辈，

① 《清圣祖实录》卷 42，康熙十二年五月戊戌。
② 《清圣祖实录》卷 98，康熙二十年十月壬寅。
③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第 4175 页。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 31 册，中华书局，1977 年，第 9281 页。
⑤ 《满汉名臣传》卷 20《色尔格克列传》，国史馆原本。
⑥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第 202 页。
⑦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第 4932 页。

但从“星南年老辞退”来看，星南和沙里很可能是塞尔格克堂兄长之孙。后“沙里缘事革退”，其佐领之职转由塞尔格克及其子阿玉锡一支承领。

（二）满洲正蓝旗寨桑扎尔固齐部众

在《清世祖实录》中与阿拜代巴图鲁一同出现的，有一位喀喇车里克部名作寨桑扎尔固齐的人，并对其有如下记载：

> 以投诚功擢阿禄喀喇车里克阿拜代巴图鲁子二等阿达哈哈番塞尔格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寨桑扎尔固齐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子查柱袭职。阿拜代子塞棱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塞勒、多尔机、绰斯希俱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寨桑扎尔固齐侄阿玉锡多尔济为拜他喇布勒哈番。阿拜代孙鄂齐尔为拜他喇布勒哈番。①

该记述明确指出阿拜代巴图鲁出身于喀喇车里克部，再次印证《家谱》有关阿拜代巴图鲁记载的可信。同时，提到喀喇车里克部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寨桑扎尔固齐。

据上述考证，阿拜代巴图鲁于顺治元年时已去世，有其子塞尔格克袭职。寨桑扎尔固齐已于顺治六年去世，因此他的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由其子查柱袭职。在《家谱》所载唐古特诺颜一支中只提到长子阿拜代巴图鲁，未提及寨桑扎尔固齐，但他很可能是阿拜代巴图鲁的兄弟。《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卷六十六《各地方博尔济吉特氏》中，对寨桑扎尔固齐有如下记载：

> 寨桑扎尔固齐，正蓝旗人，世居瑚伦博宜尔地方。天聪时，同兄弟率部属来归，授三等男。编佐领，使统之。卒，其子札住袭职。②

从《通谱》中载有列传和“扎尔固齐”称号可知，寨桑扎尔固齐在喀喇车里克部中的地位不在阿拜代巴图鲁之下。这里出现的“札住”与《实录》中提到的“查柱”同为一人。上述文献没有提及寨桑扎尔固齐的相关事迹及这一支被编入满洲正蓝旗的原因。但将这段记载中所说的“世居瑚伦博宜尔地方”与前面的《三等台吉车仁达尔巴呈报的世袭文书》中的“为归顺圣主于壬午年来自克尔楞河”相结合，可以推断喀喇车里克部南下之前的旧游牧地大致在孙杜棱的翁牛特部以北克鲁伦河下游以南的贝尔湖一带，其牧地与伊苏特部隔河相邻。归附后金后的一段时间，仍相邻而牧。这或许是学者们误认为喀喇车里克和伊苏特二部均源自哈赤温后裔所属部众的原因。据《通谱》记载，寨桑扎尔固齐之孙阿玉石在清兵入关定鼎中原的战役中立有军功。③ 寨桑扎尔固齐已于顺治六年去世，所属部众被编入满洲正蓝旗很可能与阿玉石等子孙所立军功有关。寨桑扎尔固齐部众被编入满洲正蓝旗，被编为一佐领，第二参领所属第十七佐领由其子孙管理。④

四、结语

从喀喇车里克部的安置可知，清朝统治者对归附的蒙古诸部主要采取“分而治之”削弱实力和“合二为一”互相牵制的管理措施。前者主要体现在，喀喇车里克部众先后两次南下归附后，被分散安置到满蒙八旗和外藩蒙旗等不同的组织体系之内，这最终导致噶尔玛等喀喇车里克部贵族未能单独建旗；后者主要体现在，将喀喇车里克部的主体编入翁牛特右翼旗，利用二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喀喇车里克部在参加盛京大会之前虽然是相对独立的蒙古部落，但因其跟随当时哈赤温后

---

① 《清世祖实录》卷 42，顺治六年二月辛亥。

②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部整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辽沈书社，1989 年，第 727 页。

③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部整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 728 页。

④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第 154 页。

裔所属部众名义上的最高首领孙杜棱济农来归附而失去原来的相对独立性，其首领也随之成为翁牛特部贵族的附庸，进而编入孙杜棱掌管的翁牛特右翼旗。直至清末，喀喇车里克部镇国公虽然分得部分旗务管理权，但附属于翁牛特部的局面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其部落名称也随之被人淡忘。喀喇车里克部的特殊案例可反映出，清朝在安置和管理蒙古诸部时，因对其采取的统治策略的不同而其历史命运也不尽相同。

References

Yuhai. “Qingdai wengniute youyiqi yu zhoubian mengqi qijie biangeng” (The change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Ongnigud Right Banner in Qing Dynasty). *Mengguxue jikan (*Studia Mongoliaca Collecta) 1 (2021).

Yuhai. “Kangxi nianjian guifu de kalachelikebu renhu wenti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human household problems of the Qaračerig who surrendered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Manxue luncong*(Manchu Studies Series)7. Shenyang: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17.

Jia Jingyan. “Alu menggu kao” (Research on Aru Mongolia). *Menggushi yanjiu*(Studies in Mongolian History)3.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1989.

Zhang Yongjiang. “Cong shunzhi wunian mengguwen dang’an kan mingmo qingchu wengniute, kalachelikebu de ruogan wenti” (A discussion of some issues concerning Ongnigud and Khara–cherig Mongol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on basis of empirical decree of the fifth year of Shunzhi). Tokyo: 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I. 2005.

Yuzhi. *Mengyuan dongdao zhuwang jiqi houyi suoshu buzhong lishi yanjiu*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East Princes of Yuan Dynasty and their descendants’ groups).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2019.

The Legacy of the Shengjing Conference: The Qing Dynasty’s Resettlement of the Mongolian Qaračerig Tribe

Yuhai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N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asdalai302@qq.com)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iancong of the Aisin Dynasty, the various Mongolian tribes surrendered successively. At the Shengjing Conference in the first year of Chongde, the Manchu and Han nobles and officials and forty-nine nobles from sixteen Monan Mongol tribes jointly recommended Huang Taiji as the “Bogda Sečen Khan” , formally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minister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banners and companies in the Monan Mongol region, only the Qaračerig tribe did not independently establish a banner. Subsequently, it lost its intrinsic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the tribe’s name was gradually forgotten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From Karma Taiji’s surrender in the fourth year of Tiancong’s reign, to the fourth year of Kangxi’s reign when the Sonom brothers went south to join the Qing Dynasty, the Qaračerig tribe’s return to the Qing Dynasty lasted more than 30 years.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different regimes, such as Ongniγud Right Banner, Kesigten Banner, and Manchu Mongolian Eight Banners, it was a special case in the Qing Dynasty’s management of Mongolian tribes.

Keywords: Qaračerig tribe, Descendants of Qačiγun, Ongniγud Right Banner, Eight Banners, Qing Dynasty